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的作者马建忠说：『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

汉语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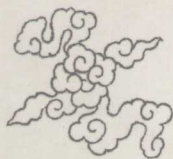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颇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者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
马氏面对着中国青少年文化落后的现状，寻找出

李先耕 著

的原因是『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其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年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明

语言研究新思维
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汉语新
论

李先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新论/李先耕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4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戴昭铭主编)

ISBN 7-5316-3718-9

I. 汉… II. 李… III. 汉语 - 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242 号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汉语新论

HAN YU XIN LUN

李先耕 著

丛书责任编辑:张玉红 张天栋 王爱琳 张佳莉
张玉娟 杨雪松 李 彤 徐德林

技术编辑:王秀艳

封面设计:张建设 伊延波

责任校对:张培孜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字数 220 千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ISBN 7-5316-3718-9/H·27 定价:12.50 元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顾问：季羨林 裘锡圭

名誉主编：胡裕树 吕冀平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小明 李先耕 李 彤

吴国忠 邹韶华 戴昭铭

主 编：戴昭铭

总 序

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推动了学术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语言学科也不例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知识最重要的负载形式和传播手段,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技术科学(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语言研究的新进展得力于知识更新。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新方法刷新了汉语研究的传统观念,拓宽了汉语研究的固有领域,促进了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推动了一批批新成果的成熟。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我们编成了这套《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学术研究最忌陈陈相因,本丛书的特点突出一个“新”字。但是,求新并不是标新立异。本丛书在求新的同时,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新思维”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 新观念,指对传统研究课题通过刷新理论或变换角度进行研究而获得的新认

识;2. 新领域,指把汉语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或技术学科的研究相结合,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而扩大的语言研究领域;3. 新材料,包括对新发掘的历史资料或新搜集的语言事实整理研究的成果;4. 新方法,指对有同国际语言学接轨意义的研究方法的尝试使用。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在总体上具有实而不平、新而不奇的特色,而对各分册则要求能自成一家言,至于分册之间在流派和方法上不强求一致。

我们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读了各自需要的任何一分册后都有所收获,不致失望。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实践检验。限于水平,疏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不吝赐正。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编委会

2001年6月

前 言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这一点对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说，确乎是对的。但是龚氏临终时所听到的鸦片战争的炮声，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从此，“西洋”诸国的“蟹行文字”爬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至文言文赶下了台。汉字拉丁化，要走拼音文字的呼声从小到大，有时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国策。这毫不奇怪，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辈们在寻找自己祖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的。这也包括对汉语言文字的反思。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说：“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颇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马氏面对着中国青少年文化落后的

现状,寻找出的原因是“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其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年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载道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于是马氏殚精积虑,“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研讨出“华文义例之所在”。他梦想“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於西人”。然后就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学习中西的文化科学知识,“群其材力,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使中国富强。

马氏“语法救国”的梦想没能实现。但这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失败并不相同。现代史上的科教之所以没能救国,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劣。马氏的“语法救国”的失败,则由于其想法脱离了汉语文的实际。当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不久,《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并在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汉语语法的若干大讨论,并且制定了用于教学的“暂拟语法体系”,50年代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实行了《汉语》《文学》两套教材,以语言与文学并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汉语教育的黄金时期。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不可能像马建忠所设想的那样,在“童蒙入塾”的初级小学阶段就实行汉语语法教育,以便学好汉语文。从戊戌变法废科举、办新学开始,小学的“国文”或“语文”课,从文言文改变成白话文之后,不是从“人手口刀尺牛羊”单纯识字开始,就是“上学了”之类的结合识字的课文。后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注音字母”课,好给生字注音;这一做法今天变成了学习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为了给生字注音。在启蒙阶段的语文课改革,有的搞“集

中识字”，有的搞“汉语拼音，提前读写”，但是似乎没有哪所学校进行过结合识字或读写而学习语法这样的实验，因为这太不符合学习汉语的实际了。

汉字问题也是一样。从清末 1892 年卢懋章“切音新字”拼音化开始，许多人都为汉语拼音化付出了不少心血。鲁迅、钱玄同都可以说是精研《说文》的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但他们都主张废除汉字。鲁迅在《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中说：“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钱玄同一方面主张汉语拼音化，另一方面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文章中更激烈地阐述他“废灭汉文”的主张：“欲废除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除汉文。”他主张在废除汉字以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 ESPERANTO。”（即‘世界语’——引者注）如果不行，那就用英文或法文。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没有钱玄同那样激进，他们似乎只要拼音化就可以了。比如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方案”之外还设计过《通字方案》，试图用拼音方法改良汉字。吴玉章、瞿秋白则试验过“北方话拉丁化”，给汉语北方话设计了拉丁字母，并想用来代替汉字。但是除了西北回民起义失败者逃入中亚的后裔在脱离中华文化的条件下，使用了基里尔字母来拼写所谓“东干语”（其实是拼写汉语北方话西北次方言加上一些俄语外来词）之外，汉语还是使用这繁复的汉字——尽管有所简化。事实证明，汉字适合汉语，虽然这同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文字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众所周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开始时都是遵循象形原则的，但是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苏美尔文字、楔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拼音文字很快就用在了印欧语系、闪含语系等语言上。而汉字却没有走上这条“拼音化”的道路。同样是接触到梵文，藏语便由此借鉴并创造出

了藏文字母,形成了古藏文;汉语虽由此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但并没有因此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就连唐人 30 字母与宋人 36 字母都还得使用汉字!)元朝的“八思巴字”是想用来拼写“一切文字”的,当然也包括汉语。尽管由忽必烈颁诏推行,但并未代替得了汉字。这当然有语言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适合汉语;更重要的则是文化的因素——中华文化是用汉字记载的,因而汉字与中华文化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汉族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就是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家,一方面说什么“夷夏之大防”,另一方面也不否认“用夏变夷”,之后的“夷”其实也就成为“夏”了。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攻击许行是“南蛮鴟舌之人”,但是又赞扬同为楚人的陈良不是“南蛮”而是“豪杰之士”,因为他“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於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我们先不谈夏商周“三代”起源于不同的部族,就拿春秋之后来说吧,先秦的吴越是“断发文身”,秦国兴起在“西戎”,中山国实为白狄……可以说都不是中原的华夏族。但秦始皇统一之后,他们不仅“车同轨”了,而且也“书同文”了。再拿南北朝的鲜卑等族来说吧,这些从兴安岭与大草原走出来的“五胡”而今安在?尽管当时的贵族子弟以“弹琵琶,学胡语”为生存求官的本领,但这些说“胡语”的“胡人”还不是早已融入了汉族之中了吗?随之而来的唐室尽管“大有胡气”,但却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可以认为,今天的汉族其实是许多种族、部族融会的结果;而汉语汉字就是这个民族熔炉的燃料与热风。

但是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汉字汉语的相信却发生了动摇。去年是《马氏文通》出版 100 周年,我曾和一些同志探讨过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会出现得这么晚,

即在1898年。如果从语言学角度来解释,不外乎汉语之内与汉语之外两个方面的原因。汉语之内是说汉语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语法系统成为必须的了。这显然不合理,因为《马氏文通》解释的是文言文,所用的例子是以先秦文献为主,下限也是韩愈、柳宗元。同样是文言文,为什么先秦诸子、唐宋名家不用语法也能很好地使用汉语汉字,而马建忠却非得要系统的语法呢?既然我们不能从汉语本身的发展上找到依据,那只能从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来寻找依据了。那就是同印欧语系这些富有语法传统语言的接触。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说:“中国文法学何以发生的这样迟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的文法本来很容易,故人不觉得文法学的必要。聪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只消用‘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也不想有文法学的捷径。第二,中国的教育本限于极少数的人,故无人注意大多数人的不便利,故没有研究文法学的需要。第三,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只有梵文与中国接触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难,与中文文法相去太远,故不成为比较的材料。其余与中文接触的语言,没有一种不是受中国人的轻视的,故不能发生比较研究的效果。没有比较,故中国人从来不曾发生文法学的观念。”胡适说:“这三个原因中,第三原因更为重要。”我们以为第一、第二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第一条。但说主要是第三条原因则是说不通的。我们先把语言的什么“高等”丢到一边去不谈,再来看看其他的话。不错,“梵文文法太难”,但英、法、德、俄,哪种语言的文法又是不难的呢?可以说,印欧语的文法没有哪一种不是“与中国文法相去太远”的。而且,要从语法的系统完整来说,古老的梵文的《波你尼经》的科学性向来为人所称道。陈寅恪就说,“西欧近世语言之文法”,“其价值,尚在天竺文法之

下”。但为什么汉代唐朝的中国人,在接触了梵文之后,从音韵到词汇都大受影响,惟独这非常有科学价值的文法却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呢?不过胡适先生的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性的,那就是我们今天对汉语言文字的看法实在是对其他语言,特别是对所谓的“高等语言”“重视”(“轻视”的反面)的结果。所谓“高等语言”这类语言学的种族主义概念完全是错误的。而现代文明中的这些种族主义论调又无一不是同欧洲中心论连在一起的。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使得许多“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物产生了“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的语言文字比中国的好这类想法。所以才会有马氏这样希望用模拟西方的语法来改造中国的语文教育的人,所以才会有卢氏、劳氏等想用拼音来改造汉字的人。也许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进程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化,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胡适的第二条理由其实对东西方基本上是一样的。西方在“发达”之前同样充斥着文盲。(一条资料告诉我们,就是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的十余所“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s”的每年十余万新生中,其中至少有一半看不懂《纽约时报》。)识文断字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是少数人的特权。但从中国的大传统来说,孟子就把读书治国说成“大人之事”,《神童诗》更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导;从小传统来说,“敬惜字纸”,设立“字纸篓”等等风俗习惯,不仅尊重读书人,连其附属的字纸都被尊崇!正是这种尊崇构建了中国的完整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马迁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史官;以后朝朝代代都有史官及其效仿者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史书,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了。而正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说

的那样,一个中国人,下了几年工夫,学会了文言文,那么他祖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都在其掌握之中了。

在面向未来的世纪末,我们却大谈其历史,未免有些不合时宜。我们愿意再一次引用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面对这富于历史感的汉语文,我们不能不平心静气地做一番观察比较,结果就是面前的这本《汉语新论》。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汉字与中华文化	(1)
第二节 汉语的单音孤立性	(19)
第三节 汉语的稳固性与开放性	(43)
第一章 汉语的地理与历史人文环境	(51)
第一节 华夏民族与汉语的起源	(51)
第二节 粘着语中的孤立语	(58)
第二章 汉语的语音	(65)
第一节 汉语的语音结构	(65)
第二节 汉语的音节与声调	(75)
第三节 汉语的节奏与韵律	(85)
附录 从普通话字音推断原入声字的一些方法	(103)
第三章 汉字	(106)

第一节 从标志与图画开始	(106)
第二节 汉字的组合性	(122)
第三节 汉字的发展变化	(130)
第四节 再论形声	(135)
第五节 汉字艺术	(141)
第六节 信息时代的汉字	(145)
第七节 汉字的读音问题	(152)
第四章 汉语的词语	(166)
第一节 汉语词语的范围与复音词的组成	(166)
第二节 汉语词语的虚实问题	(174)
第三节 汉语的语义系统之一——分类	(182)
附一 《幼学琼林》目录	(187)
附二 《骈字类编》门类表	(188)
附三 《同义词词林》纲目	(193)
第四节 汉语的语义系统之二——义项	(195)
第五节 所谓词类活用	(208)
第五章 汉语的语句	(213)
第一节 汉语的句子	(213)
第二节 句子的时空背景	(218)
第三节 句子的线索与核心	(225)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39)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汉字与中华文化

汉语是今天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据中国政府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大陆人数是113 051万人,其中汉族是103 051万人,如果加上其他少数民族中使用汉语的人数(如满族、回族中的大多数),估计中国大陆使用汉语的人数在10.4亿以上。按1996年全国人口抽样数据估计,大陆人口是122 389万人,那么按比例计算,大陆使用汉语的人数大约在11.2亿左右。加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语人口和遍布世界各地几千万的华侨,可以估计使用汉语的人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汉语还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汉语的作用与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拥有最丰富的书面文献和自公元前 841 年以来不曾中断的历史记录。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墟甲骨文,它是公元前 14—前 11 世纪中期殷商王廷的占卜记录,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从其丰富的文字词汇来看,显然是十分成熟的文字。有许多考古工作者与古文字学家把汉字的起源上溯到一些陶器刻画,比如 30 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符号,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发现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在陕西长安、临潼、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地也有发现),还有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河南舞阳贾湖的龟甲刻符都是例子。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 4 000 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 2 500 年,贾湖遗址的年代依 C^{14} 测定约在距今 7 500—8 500 年之间。这些“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距今已有五六千年以至七八千年以上。一些学者主张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刻画符号“其形体已很像甲骨文”(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失落的文明》)。汉语的历史当然更长。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所在的亚洲大陆是人类起源地,但我们发现了从距今 100 万年到 1 万年之间的大量人类化石、人类使用的工具与文化遗存。既然语言是人类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只有人才有真正的有声语言系统,那么这些人类的祖先也必然有着自己的语言。目前无论是传统的考古学手段,还是遗传学、语言学方法基本上都不承认中华文明外来说,那么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汉语的起源与发展就是可行的了。换言之,汉语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始人群语言的继承和发展。

二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直接现实”